

读史阅世

1940年慰劳之旅令陈嘉庚“已明大概”

□董立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中、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全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西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云南省为例,该省不仅在抗战中云集了上百万的军队、工厂、企业等南迁人员,还有南迁入滇的代表中国文化和科技界的几十所高等院校。另外,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是我国唯一的国际陆路交通命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全部经滇缅公路运入,而滇缅公路在云南境内长达595.4公里。云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40年,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慰劳时,曾经有过两次云南之行。第一次是1940年7月30日至8月13日,第二次是194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陈嘉庚两次考察一共在云南停留了20天。

20天里,陈嘉庚先后到访了昆明、下关、楚雄、大理等地,考察了当地的政府办事机构、工厂、学校、医院。在此期间,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了三次演讲,在西南联合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与南侨慰劳团团员、南侨机工成员、新闻界记者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获得了大量关于国内抗战的一手信息。

1937年8月20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如何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打破日军的封锁,就成为抗战的当务之急,西南运输总处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1937年10月1日成立于广州(时称“穗总处”)。1938年9月,日军进攻广州,西南运输总处西迁云南昆明(时称“滇总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管理运输的主要机构。1938年10月武汉、广

州沦陷以后,西南国际交通线变得更加重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了重要交通运输线。西南运输总处的运行情况关系着国际抗战物资能否顺利运至国内,所以自然成为陈嘉庚云南之行的考察重点。

陈嘉庚抵达昆明的第二天,专程前往西南运输总处考察,并与西南运输总处副主任龚学遂进行深入交流。西南运输总处刚成立时曾一次购置了3000辆汽车。至陈嘉庚抵达昆明时,“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维修,余者概已损坏矣”(《南侨回忆录》)。在与龚学遂的交谈中,陈嘉庚还了解到,自从英国政府对滇缅公路实行部分物资禁运后,我国在缅甸境内积存的五六万吨军火已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回国内,这使得中国的抗战形势更加危急。

陈嘉庚在云南考察期间,令他感到不胜其扰的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各类宴请。例如,8月3日傍晚,当陈嘉庚一行抵达下关时,当地的李主任“设宴三席,物味丰盛”。大概当地官员也耳闻陈嘉庚对公款吃喝一事深恶痛绝,所以这个李主任特意说明:“本午席系大理绅商招待。”意思是没有公款。这顿饭从下午1点一直吃到3点,“彼等仍呼酒令未休”,令陈嘉庚感到“甚不耐”。

这顿饭刚刚吃过,下关某医院院长又请陈嘉庚参加第二天的欢迎宴会,被陈嘉庚“极力辞却”后,又说“筵席定办不可退回”,陈嘉庚并不为所动。交通部某官员为了能请到陈嘉庚,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毕业于厦门大学,希望校主能出席欢迎宴会,但陈嘉庚“亦辞之”。国民党官场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让他感到既失望又痛心。

1939年12月6日,陈嘉庚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电报里,已谈及南侨总会即将组织南洋

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1940年3月6日,聚集在新加坡的30余名慰劳团成员搭乘海轮“丰庆”号启程,另有10余人从菲律宾、安南、香港等地出发,在缅甸仰光会合后转乘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昆明。慰劳团分为3个分团,每团15人。慰劳团一行原定4月初可抵重庆,结果迟至4月14日始到,“其迟到原因,为蒋才品翻车受伤”。蒋才品受伤后,留在下关医院治疗,其余团员则取道昆明、贵阳,最后抵重庆。

抵达下关后,当得知蒋才品养伤的西南运输医院距离他下榻的中国旅行社仍有十里路程,陈嘉庚没有丝毫犹豫,“即雇轿往十里外山中,西南运输医院,视蒋才品君伤况如何”。到医院后,他发现蒋才品在这里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环境“颇清爽”。不过,限于战时环境和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蒋才品受伤已超6个月,医生也穷尽了一切手段,“犹不能愈”。

陈嘉庚探视时,蒋才品的精神虽好,但仍无法自行起坐,大小便也无法自理。考虑到当时昆明的医疗条件有限,陈嘉庚遂建议将蒋才品转移至仰光就医。临别时,陈嘉庚还送给他500元作为零用钱。

云南的制盐业历史悠久。盐不仅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1940年8月2日,陈嘉庚按照计划前往下关考察。途中,他参观了一间由云南省政府创办的“颇有成效”的制盐厂。根据观察,“该厂煮盐虽亦燃煤炭,然系用新法”“每担盐水可熬成白盐廿斤”“每日能出盐数百担”。

在云南大理,陈嘉庚还参观了几家生产大理石的工厂,发现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均小”,而且制作大理石“概系手工”,因为没有使用机械进行精确切割,所以“制成每件成品,须损失数倍原料”。陈嘉庚感慨:“若用机器锯开,则相差甚远。”

在昆明期间,陈嘉庚还在秘书李铁民的陪同下,于8月9日夜专程前往西南联大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内容包括“侨胞对祖国经济上的贡献”。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嘉庚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勉励各位青年学子主动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陈嘉庚回国慰劳期间,发现国统区报纸对于南洋华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很少。所以,他每到一地,很注重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国民政府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他向来是直言不讳。8月12日,昆明各界召开欢迎会欢迎陈嘉庚一行,会后媒体记者见缝插针,对陈嘉庚进行了提问。因为1940年6月初,陈嘉庚刚刚访问过延安,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民选县长等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对记者说:“及至往西北各处回来,已明大概,诚百闻不如一见。”

至1940年冬,陈嘉庚的回国慰劳之旅已接近尾声。11月29日,陈嘉庚偕侯西反等一行七人离开贵阳前往昆明。11月30日深夜,陈嘉庚一行抵达昆明。记者闻讯纷纷前来采访。陈嘉庚对记者说:“余等此次返国慰劳,历时八月,遍经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行程达五万余里,用交通工具十七种之多。”(《陈嘉庚等前晚抵滇》,载《神州日报》1940年12月2日)

虽然陈嘉庚在云南只停留了短短20天,但国民政府和管理上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令陈嘉庚感到忧心忡忡。回到新加坡后,他到各地发表演讲,如实地向侨胞报告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加速了陈嘉庚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道扬镳。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畲乡风情头饰

艺苑大观

闽东畲银锻造技艺： 凤凰故事 畲银生花

□黄恩武 金丹丹

作为古老的南方游耕民族,畲族早期常用银器来承载文字的功能,用银饰来点缀生活,寄托梦想。因此,畲族银饰(畲银)可谓畲族历史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据《闽东畲族志》等记载,闽东畲族及其银饰工艺始于唐。该时期,在西北文化和经济流通日趋频繁的背景下,金银器制作技艺的传授臻于成熟,《唐六典》中曾记载了唐代十四种金银工艺,金银器在民间的使用也随之流行起来。此外,受海外贸易的推动,福建经济逐渐繁荣,各方来市的货物十分丰富,闽东的银饰工艺大约肇始于此。

宋元时期,随着闽东产银业兴盛,进一步促进了银饰在民间的普及,老百姓以银饰和服饰结合并作为日常装饰品,开始在闽东地区广泛流行。明清时期,畲族在闽东开始形成大规模的聚居,从事银饰制作行业的人日益增多,不断推动畲族银饰制造业的发展。据明万历年间《福安县志》载,时有“来去三千客,四万打银人”的盛况。

闽东畲族银饰的发展,离不开畲族几代人的匠心坚守和闽东地区丰富的银矿资源。畲银作为畲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福建省多种多样的手工艺中独树一帜。提起畲银,其“凤凰装”,精美的耳环、手镯、扁口等银饰各地尽有不同,但传统的“银凤冠”头饰是最具典型的畲族文化符号。

首先,在畲银制作过程中,对图案的选择与设计,主要来源分为两类:一是民间信仰与神话传说。在畲族信仰中,凤凰是极其重要的信仰图腾,被畲民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祇。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象。畲民将丰富的寓意与祝福寄托在一个又一个吉祥纹样中,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现实事物进行艺术加工。此外,畲族的传统审美对吉祥文字情有独钟,直观地体现了畲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其次,在熔银制成坯过程中,通过模具浇铸的方式制造器物。一是便于工匠后续的制作,二是使生产出来的畲银产品更加精细。此外,也可采用失蜡法和墨骨铸造法。在熔炼银原料的过程中,对银坯表面的污物进行酸煮去污。

第三,在畲银长期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以“操、凿、起、解、披”为精髓的雕刻技艺手法。其中,“操”是对银坯总体形体的把握,即将熔银倒入模具的整个过程。“凿”多用圆雕手法和各种圆凸刀工具,对“操”后成型的银饰进行修整、打磨与雕刻,使银饰表面呈现流畅圆润的曲线美。“起”是将初步制成的银饰取出或适当挪拉,以达到理想形状的过程。“解”是利用工具将初步制成的银饰进行大致雕刻,“披”则是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精细雕琢。

第四,银饰各部件的焊接镶嵌。各环节需要根据雕刻完成的部件以及设计的图样来依次固定。为达到理想效果,避免焊接处出现明显痕迹,对焊药的选择、温度的控制以及焊接手法等具有一定的讲究。除焊接之外,还有镶嵌玉石、玛瑙和珍珠等材料。

最后将焊接好的完整银饰用锉刀、砂轮、砂纸等工具由粗到细对其进行修整和抛光,再通过明矾水的酸液对表面进行去污处理,也就是常说的“洗银”,使银饰表面的氧化物与焊剂残留物逐渐被溶解和清除。畲族银饰从锻造到成型,需经过30多道纯手工的工艺程序,最终才能呈现精致细腻的效果。

畲族文化丰富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内涵,畲银是中国传统银雕技艺与畲族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在历史发展中承载着畲族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独有的银器语言,同时也是畲民对生存信仰和艺术文化传承赓续的需求。由此可见,畲银作为畲族民俗文化的产物,不仅展现了畲族民俗生活中的文化底蕴,也增强了该民俗的文化生命力。

在畲银技艺的发展传承过程中,畲族地方文化与银饰文化相辅相成,畲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促进了畲银技艺地方文化的传播与融合。非遗文化的传承,本质上也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本土文化的情况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自觉认知,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



鱼跃鸣笛

菽庄花园：林尔嘉的“乡愁”寄托

□赵洋 缪远 文/图



四十四桥



十二洞天



渡月亭

林尔嘉原名陈石子,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五子陈宗美的嫡生长子,6岁时过继给台湾著名的板桥林家。于是,林尔嘉在6岁至20岁期间一直生活在板桥林家花园中。21岁时,林尔嘉跟随其父林维源定居厦门。在厦门期间,林尔嘉担任不少官职,但却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一心投入实业救国当中。作为名绅富商,他不仅乐善好施、服务乡梓,还重视教育、兴办学堂。

中国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更是络绎不绝。园主人在建造园林时,往往会亲自参与设计,通过园林的景观小品将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于园林之中。而林尔嘉步入不惑之年

后寄托乡愁的方式,便是仿造台湾板桥林家花园,开辟了一座私人园林——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位于厦门市鼓浪屿港仔后路7号,是全世界唯一一座集山、海、湖为一体的私家园林。其园名“菽庄”乃取自园主人字“叔臧”的谐音,也含有“稻菽主人庄园”之意,是林尔嘉怀念先人早年在台湾垦殖谋生并家家的经历。1913年,菽庄花园落成,林尔嘉在《菽庄园记》中写道:“余家台北故居,曰板桥别墅……东望故园,辄萦梦寐……手自经营,重九落成,名曰菽庄……”透露出无尽的辛酸,这是对家乡故土的思念,也是对家国分裂的感伤。

那么,林尔嘉是如何通过鼓浪屿菽庄花

园同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建立联系的?又是如何通过菽庄花园寄托乡愁的呢?

菽庄花园通过仿造板桥林家花园的造园风格、建筑物功能、景观小品设置和命名等方面,与其建立联系,这些都是林尔嘉在板桥林家花园中生活记忆的情景再现。正如两座园林都具有江南传统私家园林风格,在此基础上,融入闽台地方特色,同时将南洋建筑和西式园林兼收并蓄。两座园林都是在园主人个人情感的过滤下,通过造园工匠的诠释,以带有地域特征的技术手段呈现。菽庄花园和林家花园一同伴随着林家几代人在两岸之间辗转起伏的人生轨迹,一种无法割舍的血脉亲缘也牵引

着两岸人民的情谊。

菽庄花园在空间布局上可分为藏海园和补山园两大部分。“藏海”隐含把山河揽入祖国怀抱,切莫再任人割裂之意;“补山”以人工补缀天然景色之不足,隐含山河破碎、亟待修葺之意。旧时各造五景,藏海五景为眉寿堂、千秋阁、真率亭、四十四桥、招凉亭,补山五景为顽石山房、十二洞天、亦爱吾庐、听潮楼、小兰亭。后来,园中又陆续建成小板桥、渡月亭、千波亭、熙春亭、郭亭、伞亭等景观。

从景观小品名称来看,眉寿堂又称“谈瀛轩”,台湾古名瀛洲,蕴含思乡谈瀛之意,小板桥、听潮楼亦有听海听潮、心系家乡之感。

从景观小品特征来看,十二洞天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的十二生肖,洞洞相连,象征着祖国人民团结一致、心心相连,也寓意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紧密连在一起的,通过修建假山,尝试填补祖国破碎之山河。

从建筑物功能来看,四十四桥下设闸门,当海水涨潮时,打开闸门让海水灌入园林当中,当海水要退去的时候,再把闸门关起来,将海水留在园林当中,仿佛整个海岸线都是园主人家的后花园。把大海藏进自己的园林之中,就像试图将祖国山河藏进自己怀中加以保护一样。

从诗联题刻来看,渡月亭中有楹联:“长桥支海三千丈,明月浮空十二栏。”其寓意为:这长桥足足有三千丈,能否通往我的家乡台湾?十二栏的明月又能否照到我的家乡台湾?

这副对联描述了园主人的思乡之情。林尔嘉常常站在栏边眺望远方的家乡,希望早日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望海”也成为其思乡系列诗中的重要关键词。

菽庄花园作为林尔嘉寄托乡愁的物质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and 人文内涵。园林通过造景、借景,反映了园主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河山一统的期待,以及对板桥故园的思念。



菽庄花园